



徽州文书的由来 及其收藏整理情况

卞利

作为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徽学学科的主要构成，上个世纪发现的南宋至民国年间近 50 万件（册）徽州原始文书，拥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那么，这些文书从何而来，又是如何流传的呢？其种类和主要内容有哪些？收藏情况又如何？对此，我们很有必要加以全面的认识 and 了解。

徽州文书遗存的原因

大量徽州文书能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

归纳起来，我们大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徽州文书本身数量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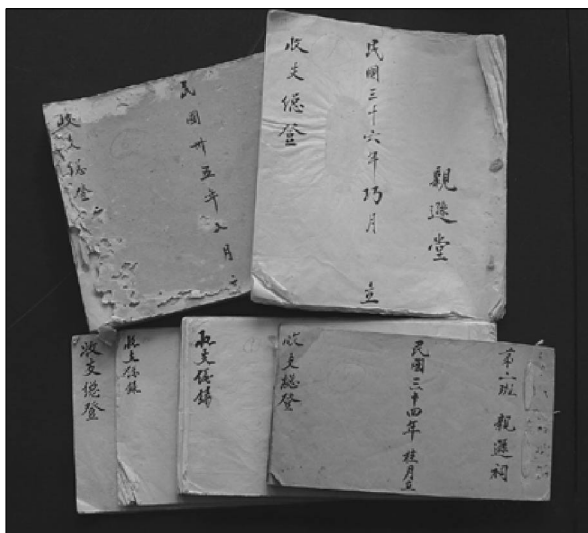
自晋代以来，中原地区世家大族为躲避北方战乱，于西晋永嘉年间、唐末五代和两宋之交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移民，使徽州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社会局面，社会经济与文化教育逐渐走上了繁荣发展之路。

由于自宋代以来,封建王朝采取了“不抑兼并”的政策,土地买卖极为活跃,“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袁采:《袁氏世范》卷三),社会上甚至有所谓“百年田地转三家”的谣谚(钱泳:《履园丛话》卷四)。由于徽州的土地买卖活动极为活跃,因此留下了大量土地买卖文书和官方税契。可以说,目前遗存的近50万件(册)徽州文书中,土地买卖和税契文书就占了将近40%。而由于租佃关系的发达,徽州的租佃文书和地租收入文书的数量也非常丰富。明代中叶异军突起的地域性商帮群体——徽商,在商业活动中重视契约文书合同等文字凭据的作用,也在其经营与管理中积累了数以万计的包括经营账簿、分家阄书和商业诉讼等在内的各类文书。作为一个聚族而居的宗族社会,徽州文书中有关祭祀、祠产购置与收支以及宗族诉讼等方面的内容尤为众多。徽州教育文化异常发达,有关学校、书院、科举等方面的文书也为数颇丰。此外,大量的合同议约、官府告示、会社规约、民刑诉状、土地赋役文书如鱼鳞图册、赋役黄册等,也构成了徽州文书的主体。正是由于徽州文书本身数量的众多,才直接形成了今日遗存下来的徽州文书数量众多的局面。

第二,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历代兵火鲜及,为徽州文书的保存创造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徽州僻处皖浙赣三省交界之地,境内峰峦叠嶂,仅有为数

不多的几条河流与外界相通。明弘治《徽州府志》云:“本府万山中,不可舟车,田地少,户口多,土产微,贡赋薄。”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徽州历史上少有战乱和兵火之灾,除唐末农民战争和太平天国战火曾造成较大破坏之外,徽州在千余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基本未受到大的兵燹影响。正如民国歙县长陈《巨川毕氏宗谱》所说:“徽居东南万山间,自中世以来,不大遭兵燹,故邑多旧家,能保其族至数百年者,盖他郡所未有也。”南宋以来徽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争为太平天国与清军的拉锯战。尽管这次战乱对徽州文化的发展破坏极其惨重,致使这里的人口锐减,但深藏于民间的各种文书却因被束之高阁而幸存了下来。此后,徽州虽然也还不断发生一些小的战乱,但对整个徽州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影响不大。即使是到了抗战时期,由于高山阻隔,侵华日军并未能够进入徽州,从而使徽州文书



民国时期绩溪县宅坦村龙井胡氏宗族亲逊堂的收支账簿

基本未受战火的洗劫。这是约50万件(册)徽州文书得以保存下来的自然条件。

第三,徽州民间保护文书与文献的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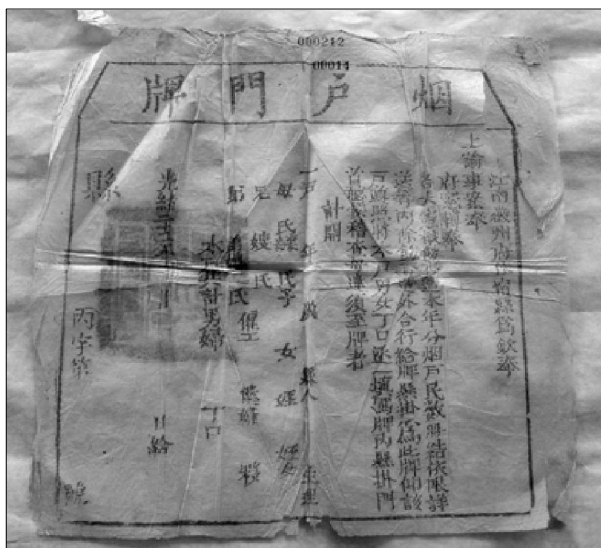
徽州拥有悠久的编纂族谱、保存宗族资料的传统,许多宗族都在其族谱中对宗族文书和文献保护制定了详细的措施。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的祁门善和程氏宗族的《羹山公家议》就曾明确规定:“递年管理开注手册在匣凡若干本,及后开新旧文契一应什物,中元交递之时,管理同接管告家长家众,照依上年交递手册,眼同检点明白。如有失落手册一本并失一契一物者,接管务要告家长家众,即时追出,仍加重罚,方许交递。”民国歙县《府前方氏宗谱》也在《祠规》中要求:“公匣,特设大柜一所,以贮红谱及本祠一切契据,慎重封锁,由族长妥为保管,无故不许私开。”而一册《余庆堂清明会老簿》更在封面上书

有:“此本老簿紧要,不可遗失,以便查阅。”此外,徽州民间还普遍拥有敬惜字纸的传统,明清时期徽州各地敬惜字纸炉和敬惜字纸会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轻易销毁字纸(含文书和文献等),在徽州被视为一种不良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保护了各种文书与文献免遭丢弃和焚毁。显然,徽州民间这种有意识保护自身形成的文书和文献的行为,是徽州文书得以留存下来的社会文化基础。

第四,徽州民间传统“健讼”行为和观念的影响。

徽州自宋代以来,逐渐形成了“好讼”和“健讼”的习俗,以致“事起眇怒,讼乃蔓延”(万历《祁门县志》卷四)。明末歙县知县傅岩曾深有感触地说:“新安健讼,每有一事,冒籍更名,遍告各衙门,数年不已。”(傅岩:《歙纪》卷五)而宗族和徽商的大规模卷入,使得徽州民间的“健讼”风气愈燃愈炽,

“致于涉讼,群起助金,恃富凌人,必胜斯已”(万历《杭州府志》卷十九)。因而,为避免可能引致的纠纷与官司之讼,徽州人十分重视文字证据的保存,每有一事,总是尽可能地留下文字依据,哪怕是家庭内的子女借贷分家,徽州人都会立下字据为凭,这也就是徽州文书中无以计数的借贷契约和分家阄书的由来。同时,在诉讼之后,为使家族成员牢记赢得官司的艰难,徽州人还会把整个诉讼的过程记录下,甚至



清光绪二十二年休宁县烟户门牌



民国时期徽州茶商做茶账簿

刊刻成书面文字。我们今天在徽州诉讼文书中看到的刻于明代嘉靖十七年（1538年）的歙县呈坎《罗氏杨干院归结始末》，就是呈坎罗氏宗族在历经八年打赢官司之后，为了让全族成员永远铭记这一事件，而专门刊刻颁行的家族诉讼文书。正是这种重视文字凭据的观念，使得包括法律文书在内的明清徽州文书比之全国其他地区，无论从数量还是种类上来说，都堪称是独一无二的。

第五，徽州文书本身的实用性价值，也是其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的一大因素。

在“民间执业，全以契据为凭”；“有契斯有业，失契即失产”（乾隆《治浙成规》卷一）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背景下，民间田宅买卖文书是田宅产权的重要凭证，田宅私有产权受到封建法律的保护。每逢政权更迭，前代的田宅买卖文书总是被新政权要求进行重新验证确认。很多明清甚至是宋元时期的土地买卖契约，在民国改元之后，并没有失去其效用，而是接受当时政府的验契。在证明合法、被粘贴上一张验契纸后，即重新获得了新政权的认可，成为拥有该块土地最为合法的文字依据。这从一个

侧面说明徽州文书虽经数百年乃至千年但依然具有现实法律效力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因此，徽州文书能够如此完整地大量保存下来，其本身的实用性价值是最为直接的因素。

第六，是官府档案的移交。

明清至民国时期，因政权的更迭，旧政权向新政权移交所保存的档案，这是徽州文书特别是官府文书遗存至今的重要来源之一。如休宁县的1138卷清代鱼鳞图册、民国徽州各地官府办理各种事务所形成的档案文件，就分别被休宁县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完整移交，从而形成保存至今的徽州官府文书。

徽州文书的流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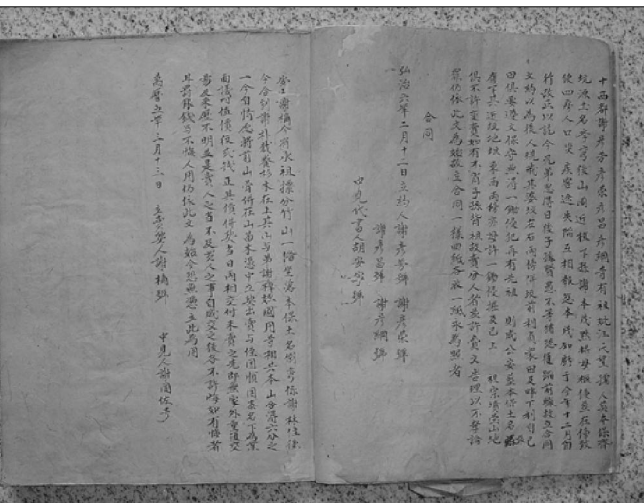
徽州文书在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向外流传。

第一次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流落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徽州人开始把家中收藏的一些文书拿到市场上出售，以换取微薄的现金，接济窘困的生活。这是



清光绪二十七年两浙盐运司给歙县盐商的执照



明代祁门谢氏谱契簿

迄今所知徽州文书向外流传的最早记录。但这次流出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目前，徽学界依然把徽州文书的最早外传时间视为20世纪50年代之后，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关于这次向外流传的徽州文书，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方豪先生曾在南京收集到一些，这批资料被先后发表于1971~1973年在台湾复刊的《食货月刊》上，在整个11篇文章中，全部以《战乱中所得资料简略整理报告》为副标题。方豪在《明万历年间之各种价格——战乱中所得资料简略整理报告之一》一文的前言中，对自己所收这批文书的由来、文书发生地和品相等作了简单说明，他说：“民国三十五年暮春，寓居南京，难民充斥，地摊上百物杂陈。有人以大批原始文献求售，本拟全部收买，但财力不足，乃选购若干……全部资料，似均出于皖南；时间则多属明代，而余收购部分中，亦有清代初叶、中叶而未叶者。一切文件，保存情形非常良好。仅少数有残损；

惟字迹则有许多为三四百年前商人习惯写法，或亦有地方俗体字。”（《食货月刊》复刊1971年第1卷第3期）可见，徽州文书在当时流传于南京地摊市场，其数量当是不少的。方豪苦于财力不济，未能大量收集，殊为可惜。这一段时间流传出来的包括徽州家谱在内的徽州文书，不仅被一些收藏家和研究者所收藏，而且也被上海图书馆等国立图书馆和研究机构进行了有目的的收购与收藏。

徽州文书的第二次流传，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之后。

1949年4月底至5月初，徽州黟县、祁门、歙县、绩溪、休宁和婺源六县先后解放并建立了人民政权。次年，徽州的土地改革运动拉开序幕。从地主家中抄出的失去了现实效用并被当作封建糟粕的大量珍本古籍被销毁，一些可能被视为变天账的文书也被拥有者大量变卖焚烧。据《徽州地区简志》记载，仅1953年一年，被屯溪和歙县两家私营土产信托公司收作纸浆的古籍和文书即达1.5万余公斤。而1956年9月，屯溪市文化馆从屯溪爆竹合作社的废纸堆中，一次就抢救出珍贵古籍400多公斤。至于大量不值钱的文书，更多的则是被焚烧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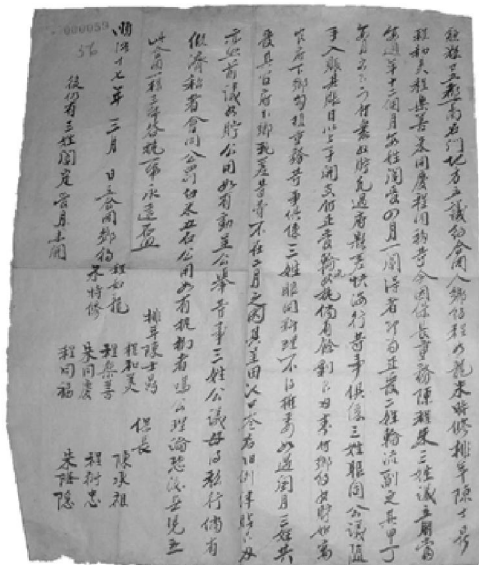
徽州各种珍稀文献和文书资料的大量被焚，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1956年10月，在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的亲自过问下，屯溪市新华书店专门开辟了古籍书店，负责收购徽州文书和古旧书籍。“徽州文书主要是由屯溪的古籍书店收购，直接或经北京中国书店、上

海古籍书店卖到全国各地去。”据当年古旧书店负责人余庭光介绍：“契约主要是从祁门收购的。祁门有个废品仓库，用麻袋装契约，有的竟用竹篓子装。1957年我去祁门收购了好几万份，装了许多麻袋运回来。我们收购的契约总数约有10多万件。”（周绍泉：《徽州文书与徽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屯溪市古籍书店把收集到的文书编制目录和价格，分别寄到全国各地的书店、图书馆、博物馆等单位发卖，其中尤以北京中国书店和上海古籍书店为主。通过这一渠道，徽州的原始文书先后流传到了全国各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南京大学历史系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档案馆、安徽省图书馆、黄山市博物馆以及黄山市属各县和绩溪、婺源等县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都是徽州文书的收藏大户。

1957年，发现徽州文书的消息首次出现在媒体上。余庭光以《徽州发现了宋元时代的契约》为题，将徽州发现文书的消息披露给世人（《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1958年，余庭光又在《文物参考资料》第4期上发表了《歙县发现明代鱼鳞图册》、《徽州地区收集到万余件珍贵资料》两文，将徽州文书的收集情况向外界作了报道。此后，有关徽州文书被发现的报道不断出现。1959年，王咨臣在《文物》当年第11期上，发表了《江西文管会在婺源收集了许多图书资料》一文，对婺源包括文书在内

的原始资料的发现作了报道。1961年，《文物》第1期又报道了《安徽省博物馆征购到两张万历年间卖身契》的消息。

1962年2月，时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著名经济史学家严中平先生鉴于徽州档案文书的完整性和重要性，专门致信中央档案馆，建议统一派人了解情况并扩大收购徽州文书的范围。中央档案馆收到严中平先生的信函后，立即由国家档案局进行了转发。当年4月，安徽省档案局在收到国家档案局的文件后，联合安徽省文化局共同制发了《关于收集历史文物、档案资料意见的报告》，指出：“根据国家档案局转发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严中平副所长关于收集皖南地区历史文件、档案的建议和省委宣传部、办公厅的指示，我们于四月二十二日进行了专门研究。一致认为这项工作很重要……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好，我们意



清顺治十七年三月歙县石门程如龙等立乡约文书



清代休宁海阳书院会课文书

见除书面通知各地、市、县文化、档案机构协助收集外，计划由省文化局、档案局各抽一至二人，省历史研究所、文史馆各抽一人，和省博物馆、省新华书店常驻徽州、安庆地区的古书画文物调查研究、收购小组参加此项工作。”（《徽州文书档案》）此后，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档案馆和安徽省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相继从徽州购买收集了一大批珍贵的徽州文书和文献。这样，从“土改”到“文革”前，徽州文书的大规模发现和收藏基本完成了，这些珍贵的文书为学术界对徽州社会经济史和中华帝国后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这是徽州文书第二次也是规模最大、价值最巨的一次流播。保守的估计，这次流传出来被各大收藏机关收藏进库的徽州文书有10余万件（册）。其中，目前已知的9件南宋时期徽州文书全部是这一时期流传出去的。

徽州文书的第三次流出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经历了10年“文革”的破坏，徽州文书再次遭受浩劫，被大量焚毁。改革开放后，密藏于徽州山区的部分文书开



明崇祯十年休宁县祝圣会簿

始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从事文物收购的商贩也认识到了这批原始资料的价值，开始大量进行收购转卖。海内外收藏和研究机构以及研究者个人，也加入了收购的行列。迄今为止，经过短短的20余年时间，又有约30余万件（册）的徽州文书流传出来。据目前所知，安徽省图书馆、安徽大学、黄山市博物馆、黄山学院、祁门县博物馆等单位所收藏的近15万件（册）徽州文书，大部分是近20年来甚至是最近几年集中收购的。一些50年代的收藏大户，在这一时期也收购了不下于3万件（册）的徽州文书。另外，据笔者保守的调查估计，北京、上海、合肥和黄山等地的私人收藏者，在这一时期也收藏有徽州文书约12万件（册）。现在，徽州文书还在不断地向外流传，乐观地估计，在徽州民间尚未流传出来的徽州文书大约还有不下10万件（册）。

徽州文书的收藏情况

徽州文书不仅存世数量大、跨越时间长、分布地区广，更重要的是，与同一时期所流传下来的其他地区文书相比，还具有启发性、连续性、具体性、真实性和典型性等显著特点（周绍泉：《徽州文书与徽学》），其学术价值是显而易

见的。有的学者甚至把它的发现与甲骨文、敦煌文书、大内档案和秦汉简帛等的发现相提并论,将其视为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

徽州文书目前在国内外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高校和研究所均有收藏,另有不少个人亦拥有一定数量的收藏。个人收藏因其特殊情况,我们无法掌握其具体数量。

下面,我们谨就所知,将国内部分收藏机构的收藏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一) 北京和天津地区

1. 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徽州文书包括散件和册籍两大类。散件的具体数量因尚未公布,我们无法得知;册籍则主要包括祭祀簿、家谱等,约有500余种,分藏在善本部和北海分馆。

2. 中国历史博物馆:收集于20世纪50~60年代,因未有系统公布,具体数量不详,据估计,不下1万件(册)。

3. 北京大学图书馆:包括土地买卖契、租佃契、合同等散件及一些册籍,总计有500件(册)之多。

4.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这是收藏徽州文书的大户,总量有1.4137万件(册),时间自南宋至民国。该所收藏的徽州文书目前整理最为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徽州文书类目》已由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5.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藏数量4000件(册)强,时间主要集中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其中分家阉书和各种账簿是其主要特色。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该馆收藏的徽州文书系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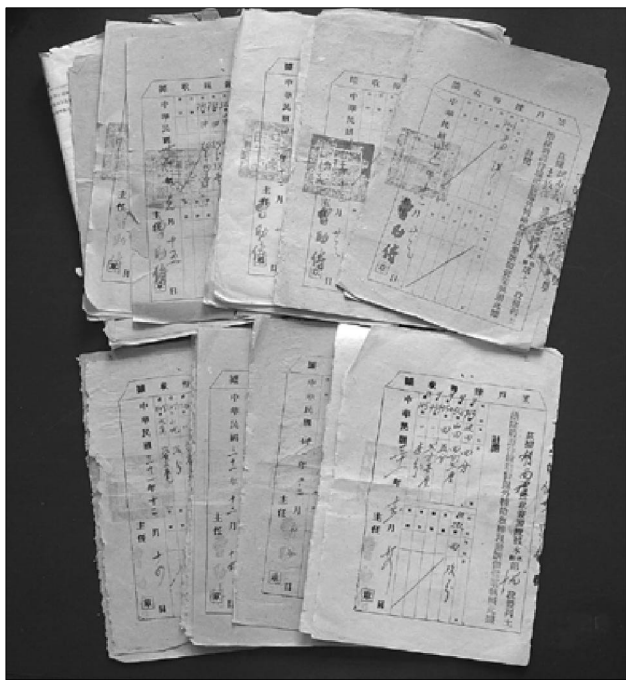
大学历史系从中国书店购买后移交而来的,总计有1500余件(册),其中明代徽州文书已收入《中国明朝档案》一书出版。

7.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因从未公布过,故具体数量不详。

8. 天津市图书馆:收藏包括路引、火票等文书约1000件(册),因种类独特而价值凸现。

(二) 上海和江苏地区

1. 上海图书馆:全部编目,以册籍类为主,主要包括鱼鳞册、祭祀会簿、分家阉书等,且不少集中在明



民国时期绩溪县宅坦村龙井胡氏宗族业户陈报土地收据

代。徽州谱牒文献是其收藏的主要特色,约有300余种。

2. 南京大学历史系图书馆:约收集于20世纪60年代初,总共收藏有徽州散件和册籍类文书近5000件(册),时间从明初一直持续至民国年间。该系所藏徽州文书有内部目录可供阅览。其散件的主要特色是各类合同,约有清代徽州各县合同50余件(册)。册籍类的主要特色是会社文书和典当文书,特别是装订成5大册的休宁县《祝圣会簿》,自明崇祯十年一直延续到民国37年(1637~1948年),每年的会社活动情况,都有详细记录,其学术价值极高。

3. 南京图书馆:约收集于20世纪40年代末,从未进行过整理,大约有百余件(册)。

(三) 安徽地区

1. 安徽省博物馆系统:安徽省博物馆、黄山市博物馆及所属县博物馆约收集徽州文书5万件(册)。其中,安徽省博物馆于20世纪50至60年代集中在徽

州收集的散件和册籍合计约有4000余件,时间自(南)宋、元、明、清,直至民国,该馆收藏特色主要是明代各种赋役黄册、会票、会社文书等;黄山市博物馆收藏徽州文书总量约3万余件(册),各种册籍类文书应有尽有,散件类文书亦种类繁多,价值连城,但因人手和经费限制,至今尚未系统整理;歙县博物馆收藏有徽州文书主要是歙县文书300余件(册),其中以散件居多;祁门县博物馆主要收藏祁门县文书5000余件(册),以清代和民国者居多,各类告示、会社册籍、散件均有,该馆收藏的最大特色是其归户性,且跨越时间长、连续性强,其中环砂文书约1700多件(册),时间跨度自明初到民国,内容则包括土地山场买卖、租佃、告示、合同等,学术价值极强。

2.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收有徽州文书1.0254万件(册),以清代和民国时期为主。该中心收藏的徽州文书散件和册籍最大特色是归户性较强,且已整理出内部目录供参考。该中心收藏的徽州文书正陆续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

3. 安徽省档案馆系统:安徽省档案馆、黄山市暨所属县区档案馆和绩溪县档案馆共收藏有徽州文书10余万件(册)。其中安徽省档案馆约收藏8.3万件(册),其散件中之休宁县土地归户票较为齐全完整,其他诸如清末祭祀类文书和民国官府移交档案文书较有特色,该馆所藏徽州文书目录已被整理出版,题为《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黄山市档案馆收藏5600多件(册);歙县档案



清光绪乙酉年皖南茶稅請免改厘增課全案錄

馆收藏 2052 件(册),以散件居多;休宁县档案馆收藏共 4240 件(册),其最大特色是清代休宁的 1138 卷鱼鳞图册,不仅系统,而且完整;黟县档案馆约千件(册);绩溪县档案馆共收藏绩溪文书近千件(册),且主要集中在土地买卖契约、账簿、税票等方面。

4. 安徽省图书馆:该馆收藏的徽州文书约有 3000 件(册),基本为土地山场买卖与租佃契约。该馆藏书各类册籍文书如诉讼类文书、会社类文书和各类日用杂书等颇具特色。

5. 黄山学院图书馆:该馆收藏的徽州文书总量有近 6 万件(册),全部收购于 21 世纪初。具体种类因正在整理,尚无法得知。

其他收藏徽州文书的单位还有江西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浙江省博物馆和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等,因较少公布和利用,其数量尚不得而知。国外诸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犹他州家谱学会、哈佛燕京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京都大学东洋文化史研究所等,亦有不少徽州家谱、书信和文书收藏。

至于私人收藏者,目前已知大约有海内外收藏者 20 余人,其收藏数量估计不下 10 万件(册)。

因此,综合国内外收藏的基本情况,我们乐观地推测,现存徽州文书总量应当在 50 万件(册)左右。

以上是有关徽州文书收藏的基本情况。应当说,由于受到阅读范围的限制,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还是很全面的。特别是在徽州民间,目前到底还有多少



明崇禎至清雍正年間休寧金氏置產簿

文书没有流传出来,这显然是无法作精确统计的。

徽州文书的整理情况

随着徽学和徽州文书研究的不断深入,海内外学术界对徽州文书整理与出版的呼声渐高。事实上,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即开始对徽州文书进行编号整理。1982 年秋,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倡议下,安徽省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及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在合肥召开了有关徽州文书整理与出版的研讨会,共同决定整理出版各自收藏的徽州文书。1983 年,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设立了徽州文契整理组,专门负责该所徽州文书的整理工作。1988 年,由安徽省博物馆主编的《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该书收录了明清时期徽州的卖田契、卖田皮契、卖地契、卖山契、卖塘契、典当田

地契、加价契、租田地文约、租山文约、庄仆还约文书、对换田地文书、卖屋契、卖地基契、典屋契、租屋文约、卖身契、借贷契、其他共18类文书950件(册),分门别类地对安徽省博物馆系统馆藏的明清徽州文书进行点校整理。这是目前所知明清徽州文书最早也是最为系统的整理出版成果。1990年,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整理的《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辑,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1991年,该所王钰欣、周绍泉主编的40卷《徽州千年文书》,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迄今为止最早也是部头最大的徽州文书影印本,收录了4000余种徽州文书,分(宋)元、明编和清、民国编两大类,各占20卷篇幅。这部大型影印本徽州文书汇编,使得不少海内外学人得以一睹徽州文书的原貌。199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张传玺教授主编的《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上、下册)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包括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其他相关单位收藏的宋、元、明、清至民国时期的700余件徽州各类文书。这是北京大学收藏的徽州文书首次向世人披露。

一年后,安徽省档案馆严桂夫主编的《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出版面世,该书收录了安徽省档案馆系统以及南京大学历史系收藏的徽州文书目录。目前,徽州文书的收藏单位特别是超过数千件(册)的单位,大都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形成内部目录,有的则已整理出版。

进入21世纪后,徽州文书的整理与

出版工作进程加快。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将该所收藏的1.4137万件(册)徽州文书的目录全部分类整理,编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徽州文书类目》,2000年由黄山书社出版。该所陈智超教授整理的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明代徽州方元素信札700通,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为题,2001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刘伯山将该中心收藏的明清至民国年间的1.0254万件(册)徽州文书,全部整理编目,其主编的《徽州文书》第一、第二辑共20卷,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4和2006年分别出版,该书的显著特点是归户性,即以每一家族为归户性文书,不分巨细,悉数收录,保持了文书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此外,国内外私人收藏者也对自己收藏的徽州文书进行了简单的整理,在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的《田藏文书粹编》(共3卷)中,数十件珍贵的明清徽州文书被编入该书。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臼井佐知子教授将其收藏的歙县程氏文书题名为《徽州歙县程氏文书·解说》,于2006年由日本三元社影印出版。

徽州文书,因为其珍贵的学术价值,正在被海内外学者所关注。相信随着徽州文书的不断整理和出版,徽学研究也必将迎来一次新的高潮。

(题图:明天启元年二月休宁凤山余阿蒋手模卖山契)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